

1995年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摘要）

唐士其

专 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研究方向：当代国际共运

指导教师：张汉清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某个社会共同体中合法垄断着暴力的使用权的机构与其他的社会构成体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等级制的行政性联系与其他社会联系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在强制与自由、秩序与离散、等级与平等这样一些范畴之间的对比程度的反映，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实际上内在化于该社会共同体的宏观结构之中，受到其历史与传统的强烈影响。

一种特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同时体现出在伦理—道德、政治—法律以及组织—管理这三个层面上的相应内涵，由于这三者拥有各自不同的评价标准并有其内在的逻辑含义，因而三者就既可能协调一致，也可能相互冲突，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了该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发展与变动。

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不同阶段，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表现出很不相同的特点，也就是说，出现过完全可以识别的不同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在欧洲历史上，大致就出现过古代希腊罗马的、封建主义的、专制主义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模式以及社会主义模式。这些不同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的演进，既是社会自身演化的结果，又是该社会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

产物，同时还反映了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对于他们共同的社会生活的一种认识。不同的模式既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顺次更替的一面，又有在同一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空间范围内并列展开的一面，因而，对它们的认识与评价就不可能采用单一的、抽象的标准。

在传统社会，决定某一社会共同体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更多是这个社会自身的演进，以及其传统与惯性的作用。但自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几次产业革命对于社会生产的巨大推动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越来越深的程度上受到了某个社会共同体与其外部环境的的影响。由于无论战争时期还是平时时期，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变成这个社会共同体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又因其制约着社会资源的分配以及社会的组织与管理方式，因而它也就对国际竞争与国际压力采取了积极的回应。

人类社会生活的实践表明，当一个社会的资源相对量比较丰裕，外部环境比较宽松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可以表现出较多的自由与较少的强制；如果相反，必然会出现较多的强制与较少的自由。因而，在自由资本主

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之下率先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对于那些经济发展程度落后于它们的社会共同体而言就构成了双重的压力，它们丰裕的物质生活与相对自由的社会组织形式成为后者努力效仿的标本，而后者为了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又不得不对社会进行较多的组织与强制，并对其居民的生活消费进行一定的约束。这两者的矛盾与冲突是显而易见的。正是这种矛盾与冲突决定了后起的现代化国家（也被称为东方国家），在近代以来的历史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变动得剧烈和频繁。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设想，伴随着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国家将逐步消亡。但是，在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那些东方国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演变却展现出同这种预言方向相反的特点。国家不仅没有消亡，而且走上了一条不断强化自身的道路，最终造成了社会的国家化。这一过程曾经极大地推动了这些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很快又因为国家对社会自身发展活力的窒息而使社会陷入停滞，并且导致了国家与社会的离异与冲突，甚至引起了一些国家政权的崩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这种颇具戏剧性的变化既鲜明地反映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固有的规律，也深刻地揭示了东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尖锐矛盾。

东方国家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不仅是这些国家现代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的结果，而且也是这些国家在近代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中，对于自身的现代化道路的艰苦探索的一种自然的结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这些国家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摆脱严重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又使它们能够大规模地动员社会资源，从而为现代化创造一种新的、不同的外部和内部条件。

作为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代表的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经过短暂的消灭国家的试验，很快就走上了全面强化国家政权的道路，这一转折正是现代化的逻辑作用的结果。为了发展经济，尽快地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虽然社会主义的建立可以切断苏联经济与世界市场的联系，然而却无法消除强大的西方对于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在军事上的威胁——，苏联不得不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其国民经济进行全面的组织与管理，以求得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高效率。这一过程从国内战争开始经新经济政策稍作停顿，到工业化时期又加速进行。另一方面，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社会内部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旧的剥削阶级的残余与工农的冲突以及工农之间的冲突），也使得苏维埃政权必须依重于国家这一强制性的机构，来实现社会经济过程本身所不可能实现的社会整合。

因而，经济发展与社会整合，这成为促使苏维埃国家政权不断走向强化的两个关键性的因素。这两者有其内在的一致性，即为实现工业化而进行的强制农业集体化以及对农民的剥夺，这本身就是社会整合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样，经过农业集体化与工业化，苏联在取得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了其社会的高度同质化。至于国家政权的强化及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既是这一过程的原因，又是这一过程的自然结果。

苏联把社会的同质化及国家化当作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标志，但等级制行政关系向全社会的渗透很快就走向了其合理性的反面。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家机构的膨胀超过了一定限度，反过来导致了行政效率的递减以及官僚主义和特权现象的滋生；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国家并不能如其所愿，完全控制社会成员的需求、观念与行为。在后一个问题上，东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再次表现出来——社会现代化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

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而确立下来的，无论是政治上的民主还是物质生活上的丰裕，而且全球化的浪潮把这些现代化的标准直接灌输到社会主义国家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身上，成为一种与国家相抗衡的塑造着人们的社会需求的力量，从而直接造成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张力——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片面强调积累、强调重工业而忽视了对人民的物质需求的满足。

国家与社会之间这种张力的存在使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进一步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这样一种连续的反馈过程使国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从而导致了政治上的高度集权，经济上的停滞，以及整个社会的保守化。社会主义不能满足的需求或者造成了社会对国家的冷漠与离异，或者造成了社会与国家的对抗和冲突。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已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苏联东欧在危机形势下改革的举措失当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崩溃的主要原因。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在8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全面改革的浪潮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为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调整，指出了一条比较有希望的道路。

改革的一个总体方向，是减少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幅度和强度，限制等级行政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的范围，充分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积极主动的作用，尤其是各种经济实体以及市场原则在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联系方面的作用，其中心任务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在这一方面，中国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在未来的改革中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

然而，改革不能走向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另一个极端，即古典自由主义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在当代世界，发达资本主义

社会由于福利国家的建设以及经济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国家已经越来越多地介入社会生活。至于在成功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国家权力更是发挥了广泛的作用，无论是在维持国内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还是在进行经济发展的规划和保护国内关键产业方面都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强调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作用是有其合理性的，只是它把这种合理性推向极端从而走向了反面。

因此，对于中国进一步的改革而言，正确的方向是合理配置国家的社会职能，在总体上改革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前提下，不排除在某些特定的方面（象国民教育、社会保障、建立健全法制等）强化国家职能的可能性。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未来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应该体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价值规范、现代国家的一般特征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独特要求。据此，可以提出一种“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这种模式强调社会较大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也强调国家发挥相对广泛的社会协调与控制职能，同时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一种相互合作、彼此推动而非相互对立的良性互动机制。

应该说，在中国建设一种“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既有其理论基础，也具备实践上的可能性。从理论上说，人们一直致力于探索一种同时避免极端的个人主义与完全的极权主义弊端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也就是一种个人与社会协同进步的模式。古典自由主义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失败以及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优越性的丧失，更加强了这种理论探索的迫切性。西方出现的“合作主义”理论及其在西北欧国家的实践，就是在这方面一种很好的尝试。从中国的实践来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以及政治协商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则为“强国家—强社会”的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型模式的建设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不仅必须克服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超越迄今既存的人类社会共同生

活的逻辑，唯此中国才能真正得到发展，才能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贡献。因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自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在东方国家的实践中在更深层次上的继续，也是历史为社会主义提供的又一次机会。

论非洲社会主义的演变（摘要）

周永亮

专 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研究方向：当代国际共运

导 师：张汉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大陆迸发出一股强大的社会主义浪潮。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突破性发展及资本主义制度试验在非洲的失败是这一现象的直接成因。与战前相比，二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组织程度明显增强，涉及的地域空前广阔，并导致了一系列独立国家的诞生。这种突破性的变化既是殖民剥削日益沉重的结果，又是帝国主义一再发动战争而使其日益衰弱的产物，因此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及广大非洲人民极其厌恶资本主义。这种意识成为非洲人追求社会主义的直接思想动机。然而，许多非洲新独立国家选择社会主义更直接的原因来自独立初期资本主义试验的失败。埃及、刚果、贝宁等国在独立之后先后确立了资本主义体制，致使社会形势动荡不已，经济处于畸型状态或崩溃边缘，现实社会主义模式自然成为新独立国家的选择。

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及西欧国家内左翼社会运动的高涨，构成了非洲社会主义勃兴的时代前提和国际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爆发，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和反动性，直接促成了殖民统治在非洲的瓦解。目睹资本主义造成的腥风血雨、身受殖民主义的切肤之痛，非洲人民觉醒了，时代告诉他们，资本主义制度是万恶之源，这一意识逐渐成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流意识和精神支柱。与资本主义危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战后初期苏联在经济方面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以及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现实社会主义展现了新社会发展模式的活力，响应了第三世界人民反抗资本主义的思想感情。此外，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大多留学欧美，与欧美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及其他左翼人士有广泛接触，并深受其影响。这对他们选择社会主义模式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社会主义思潮在非洲大陆的长期传播、非洲大陆特定的阶级状况是非洲社会主义勃兴的内在基因。自19世纪始，社会主义思潮就已在非洲传播开来。殖民压迫的加深、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该思潮拥有了更广泛的影响。此外，特定的阶级状况是非洲社会主义